

“改作风”中央带头 地方更应快步跟上

“就地办理准生证”是公共服务回归

针对广为诟病的“准生证”难办的现象，国家人口计生委4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简化办证程序，解决群众办证难问题。根据通知要求，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者出具婚育情况证明等，符合办理条件且材料齐全的，要即时办理。此外，流动人口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孩子都生了，准生证还没拿到手”，最近，准生证办证难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各地不时出现的“准生证”难办事件，起因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因为结婚没有上报，有的因为没有“走动关系”，有的因为没有计划生育服务证的空白本，各种荒唐的借口让人忍不住在网上吐槽——准生证成了“折腾证”。

准生证又名生育服务证，言下之意是为公民生孩子提供服务的。既然是服务证，就当以简便便利的服务流程，让公民以最小的成本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然而现实中，由于各地准生政策互不统一，材料要求、手续流程相差千里，有时还相互“打架”，给办证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关卡，准生证也因此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办证件”。

2009年10月之前，流动人口的准生证一律在户籍所在地办理。此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实施，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但目前来看，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在“配合”上显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居住地说，要到户籍所在地开具流动人口证明等相关材料后，才能到居住地办理准生证；可户籍所在地却说，一般情况下，为方便管理，应到居住地办理。再比如，居住地要求户籍所在地开具“初婚初育”证明，可户籍所在地又说，你都不住这儿了，我凭什么给你开“初婚初育”证明……

凡此种种，表面上看是各地的“土政策”卡住了准生证，但在这背后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管理步伐没有跟上人口流动的节拍，从而更凸显了放权给社会、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改革之必要性。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性加强，以前是“单位人”，现在在很多已转变为“社会人”，这种人口分离对计生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再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来处理准生证的申请办理，不但人为地给民众添加麻烦和成本，也不符合现代公共服务便民利民的人本理念。

因而，人口计生委强调就地办理准生证，并实行“首接负责制”，在积极回应民意诉求之外，也体现了公共服务的回归，有助于清除办理准生证的“地域壁垒”。人口计生委的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约6700万人，这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以外地区生育的，约占全国流动人口生育总数的六成，生育头胎可就地办理准生证，是对这部分庞大人群的“减负”，更是对公共服务的“提速”。

以此类推，既然被戏称为最难办的准生证都可就地办理，那么在其他领域，还有多少类似准生证的个人证件同样可以就地办理？再进一步追问，还有多少户籍壁垒可以通过改革逐渐清除？比如眼下诸多流动人口一样关注的异地高考。 李龙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再次身陷舆论漩涡。日前，武汉大学举行119周年校庆活动并宣布120周年“校庆年”正式启动，却招致包括老校长刘道玉在内的众多武大校友的质疑，他们认为，武汉大学的前身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建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自强学堂并无传承关系。

高校何必苦苦攀“先祖”

武汉大学究竟起源于1913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还是师承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这自然有待高校历史研究者的学术钩沉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判断，本文无从置喙，也无意陷入口诛笔伐的是非之中，只是高校回溯校史，向来是一笔糊涂账，这种现象值得玩味，也值得思考。

这些年来，给自己找一个出道早的“东家”，似乎成为一些高校竞相追逐的时尚。只要有蛛丝马迹可以凭借，哪怕只是名字上相似，牵强附会的有，偷梁换柱的有，移花接木的也有，向前延伸校史风，在一些高校吹得亦不亦乐乎。比如所谓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全然无视岳麓书院在明清两朝的中断，更对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的不同熟视无睹；比如青岛大学与国立青岛大学，除了名字共用了“青岛”之外，真是找不到任何师承关系的证据。

深厚的历史底蕴，确实是高校最具魅力的地方。那些时代久远的教学楼，从历史中走来的图书馆，青砖堆砌的运动场，漫步其间让人产生一种历史传承的厚重感，这是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负笈求学之所。然而，历史底蕴有没有，这是历史所决定的，又岂是回溯校史就能够创造出来的？

明明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校史，硬要傍上一个“阔东家”，是不是有点不自信呢？这其实折射出急功近利的办学心态。历史底蕴能够创造出知名度，于是修改校史蔚然成风；办二级学院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于是二级学院遍地开花。总之是什么有利做什么，至于教育本身的人文关怀、百年树人，则居于其次矣。

话说回来，校史真有那么重要吗？校史的长短，真的与学校的好坏成正比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校史短，可以凭借踏实办学把学校办好；校史长，也可能因为急功近利把“祖荫”挥霍殆尽。学校好坏，并非取决于陈列于博物馆的校史手册，它就掌握在当下办学者手中，你怎么样，高校就怎么样。对创造知识、传承文明的高校而言，校史的确很重要，但还不是学校好坏的决定因素。今天的成就是明天的历史，与其煞费苦心向老祖宗索要历史传承，不如静下心来把学校办好，为后人创造新的历史传承，这样不是更好吗？ 李拯

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包括，“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对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等，这些规定具体、明确、细密，令人期待。

不必要的会议少了、交通管制减少了，城市的道路就会更通畅；领导在媒体上出现的“数量、字数、时长”被压缩了，更多的民生新闻就能获得关注。可以说，每一条规定的落实，都将会转换成民众利益的提升。

这八项规定虽然是明确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但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贯彻落实办法。有了中央的带头垂范，地方更应快步跟上。

实际上，干部作风问题，在一些

地方屡屡被民众诟病。不久前，某地一个人工湖蓄水仪式上，近百米红地毯铺到湖中心，只为迎接领导的短暂时刻；一个县级的市委书记去外地参加完会议，就有人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至于接待上级领导长达数十辆轿车的车队，主要领导到县界、市界甚至省界迎送的场面，亦不鲜见。而每每不期而至的交通管制，更是给人带来很大困扰，民众愤有烦言。

还有会风、文风的空话、套话，也让人生厌。这些天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媒体见面会上的务实发言，到李克强副总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纷纷打断相关人员念稿发言，均令人耳目一新，透露出一种清新的会风、文风，而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热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意的殷殷期待。

政治本来就是治理众人之事，而理想的治理愿景的实现，往往并不需要诸多繁文缛节、夸张铺陈，只要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从民众出发，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虚空、飘浮，

热衷于搞一些形式上的花花哨哨，就会赢得民众的信赖。可见，工作作风的改进，也不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变化，根本还在于执政理念的刷新。

“八项规定”为各地、各部门改进工作作风提供了一个范本。以此为基点，还有两项任务，一是对基层也制订更为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改进作风细则，以为官箴、以为铭石；再就是严格的、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严厉的考核要求，不仅各地每年要对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要定期督促检查。改作风，绝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当然，让改变工作作风取得实效，既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也需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多个平台，让民众监督发声、发力。

期待各地各部门循着“八项规定”所确定的路径，通过上下互动，和那些官话、套话以及诸多不良的工作风气，彻底说再见。

京文

网购瘾



日前，河北石家庄市一对年轻夫妻因网购产生争执，并当街吵架动手。原来，夫妻俩都是普通工薪阶层，生活并不宽裕，妻子却沉迷网购，连家具都是网上买的，甚至为4岁的女儿购买了10岁才能穿的衣服。(《燕赵晚报》)

如今，网购使人们实现了足不出户便可轻松购物的梦想。在刚刚过去的“光棍节”上，电商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让人们再次见识了网购的疯狂。的确，与传统上街逛店的购物方式相比，网购以其省时省力省钱的明显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购族”。而与掏出白花花的钞票相比，网上支付方式也让不少“网购族”放松了捂紧钱包的手。于是乎，看到网站上花

花绿绿的商品，一些“网购族”渐渐失去了购物的理性，在一些电商所谓“低折扣”的引诱下，他们甚至连一些根本用不上的商品也不放过，不知不觉中，便网购成瘾。生活有时就这么幽默，就在很多成年人给孩子们网购问题头疼不已的时候，自己却得了和孩子们一样性质的毛病，掉进了“网购瘾”的泥潭。 文/小正 图/春鸣

官员题字当自警

近日，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原局长王立军题写的“剑”、“盾”两字已被铲除。(12月4日《新京报》)

王立军倒了，关于他的多种负面消息不断被曝出。比如，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当年就是由王立军处理，王立军两年内更换51任秘书，对待下属极为刻薄，等等。而作为他劣行清算的一大后戏照例是：他在公安局门口的题字终被铲除。

关于王字之被铲，有认为该铲的，也有认为不能因人废字的，还有认为应该留下来以便起到警示他人的。我认为，王的字，真可谓警示的宽枉去的糊涂，算是随势俯仰人心难料的一大见证。想当初，王立军权势烈焰炙手可

热之时，假定没有捧哏的人们大加鼓噪，并非书坛高手的他，恐怕是不至于主动要求题写那些劳什子的。当他本人挥笔而就之际，也实在是没有想到面临的竟是“共亡也忽焉”的下场。

古人追求立言立德立功，题词题字之类，大约算得上是想不朽立言之副产品。而与世界各国要人题字大异其趣的是，中国官员的题字除了传递某种要求、志向、意境、思想等之外，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

比如题字的书法之美。中国书法有独特的讲究，并不因为你的官阶很高，字就真能身价大涨。所以仅从书法美的意义上讲，即便题字的官员无甚大恶，能得以善终，他的字如果在书法的层面上立不住，则无论其在位时被人捧得多高，吹得多漂亮，终究是不

免人走字难留的。由此观之，在书法二字面前，明智的官员是要把题字视为畏途的。

再比如题字的警示意义。书以载道，官员题字亦大多具有警示意义。胡长清的题字，从书法的角度看，敢挑别人的人不多，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官不在字亦被铲的结局。人都说字如其人，但是如果他本人的信仰、言行远远偏离了书法之美，也容易成为所谓分裂人格的证据。王立军所题写的“剑”、“盾”，当警察所需要的秉公执法刚毅正直勇敢等意思跃然纸上，但他又何尝具有自警的作用？古人云：“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身居高位，题了字放在那里却只知无愧，不思自省，即便勒之山石，期望不朽，但是行事做人愧对那字儿，又岂能长久乎？ 采桑子

房产作为财产公开突破口切实可行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多位专家谈到尽快实行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问题。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发言时主张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12月2日《新京报》)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一直是社会的期盼。在反腐败进入新格局，“深水区”的背景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已无法回避，只能以积极而大胆地探索，来推动反腐进程。

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比较大。鉴于在已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不少腐败官员占有多套房产，让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较好线索。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建议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无疑很具现实性和针对性。

而且，在腐败案例当中，我们也发

现，房地产作为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官商联动的腐败，往往处于高发态势。近年来，因为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而落马的官员也是不少的。有些官员就是因为借管理房地产的便利，而走上了腐败道路。

从房产方面找到腐败线索，查处腐败分子，操作性较强。因为房产需要实名登记，要核查官员及其配偶、子女名下的房产状况，到各地房地产管理部门一查便知，实施起来方便可行。而一旦官员及其家属拥有大量的房产，与自己的收入状况不符，便可以进入反腐败机关的视线并及时查处处理。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势在必行，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无疑是制度试水的有力“抓手”。制定实施房产反腐制度和机制，宜早不宜迟。 吴杭民

3岁双胞胎扫马路也可以很温暖

近日，西祠胡同论坛上的一篇名为《我们帮奶奶扫落叶》的网帖引发众人关注，照片中两个穿着、打扮一样的小女孩，一个拿扫帚，一个拿簸箕，在一个年轻女子带领下，像模像样地清扫落叶。这对3岁的双胞胎姐妹，已经上了幼儿园，平时与妈妈、奶奶住在一起。50岁的奶奶在附近一间公厕做保洁员，小姐妹很懂事，经常帮奶奶做些事。(《扬子晚报》12月4日)

这是一则让人温暖的消息。双胞胎小姐妹可爱、懂事，她们的妈妈也善良、孝顺，奶奶则尽职尽责。可以说，这是一个虽然生活不甚富裕，却和谐温馨的外来务工人员之家。联想起此前媒体报道过的一些类似小女孩帮助奶奶扫马路等个案，不免感叹，其实，生活可以有很多样式，未必个个悲情。坚硬的城市土地之上，3岁双胞胎帮奶奶扫马路的故事，同样也可以让我们很温暖。

时下的网络乃至传统媒体上，多有个体的悲情故事。特别是在涉及底层人物时，这种悲情往往会肆意流淌，淹没了很多人的善良心坎。我丝毫不否认这类悲情故事的真实性，值此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讨生活，不仅城市没能做好各项准备，敞开心怀迎接这些外来人员；即便是农民工自身，也缺乏足够的心理、教育乃至技能上的准备，只是随着浩浩荡荡的进城潮流，到处流浪。原本就生活于城市的一些底层市民，也在机缘巧合之下，被高速运转的城市甩了下来，成为一个悲情故事的主角。

在长时期、习惯性的思路引导之下，媒体也好，公众也罢，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认知，即大凡此类事件，无不是浸透了汗水和泪水的悲伤事件，其中多的是一个个走投无路的零余者。导致如此这般的原因，则无非是社会的错、公权力的失职等。然而，这样的认识并非事实的全部。

一者，进城农民工自身的积极与否、勤奋与否，往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在城市能否存身立足。以3岁双胞胎一家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可能很辛苦和清苦，但他们还是以诚实、努力、尽职，把工作做到最好，并获得了周围人的认可。事实上，这里边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做法，更涉及人生的态度问题。与抱怨相比，务实、进取的人生更能够赢得敬意。

再者，城市化转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从制度设计上讲，我们固然希望让所有人都享有更多的福利、支付更少的成本，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很难完全按照精密设计来行事。一部分人被暂时甩下，往往难以避免。在需要做的，是政府多一些责任意识，并尽可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相互帮衬，让排队的人越来越少，直至大家共同奔向美好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进城农民进一步增加，相信类似草根故事会越来越多。但愿大家都葆有一颗平常心，正常看待这些故事，不要总是满溢着悲愤，并在抱怨、指责中释放自己胸中的戾气。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相信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有悲情，就有温暖，悲欢交集，方是常态。 胡印斌(晚报)

作为同行企业的联合体，行业协会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协调成员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

酒类流通协会不能变成“酒鬼协会”

12月3日，在停产6天后，酒鬼酒宣布完成整改，恢复包装生产。塑化剂风波持续十多天，其间两家行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先后发声，力挺白酒行业。随着事态扩大和发展，又先后失声。据记者调查，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的会长和常务副会长，分别是酒鬼酒董事长和执行董事。

一个行业协会，会长和副会长竟为同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也就难免让人觉得，身为“局内人”的行业协会，对各种传言的“澄清”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有人以为，正是行业协会的不作为与乱作为，让这场塑化剂风波愈演愈烈、升级为白酒业的行业危机。

理论上讲，行业协会应当是同行企业的“自我管理中心”。作为同行企业的联合体，行业协会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协调成员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行业协会实际沦为个别公司的“外联部门”，只具有垄断性而不具备代表性，很难让人相信其能够维护好行业利益乃至公共利益。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早在2011年6月，台湾发生塑化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酒业协会已发现白酒产品中基本都含有塑化剂成分，但并没有让普通公众知情，塑化剂危机被隐瞒了17个月。如果酒业协会当时能够借助该事件进行自我审查处理，其震荡与影响应该比现在要小得多。遗憾的是，酒协采取的不透明做法，不但对行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

事实上，行业协会没有承担起自律职责的事件并不孤立，反而经常在某产品出现质量或是服务问题时，以不恰当的方式“挺身而出”。例如，近年来我国白酒业也屡屡出现丑闻，但在关键时刻，行业协会却向国家相关部门游说降低行业标准，这种只为本行业“服务”，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最终导致很多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不信任。

与之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行业协会不仅自清门户，维护本行业信誉，而且他们有时会走得更远。比如建立高于“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不少企业行使自愿监管机制，并让社会来监督。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行业协会通常实行理事会议决策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协会主席轮流坐庄，秘书长受雇于协会，执行协会决策；在决策上，则通过专业小组或专业委员会提供依据，主席会议进行决策，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部分大企业控制行业协会，导致协会丧失服务整个行业的立场，仅为少数人或企业牟利。

事实证明，如果行业协会只看到企业利益，而忽视甚至伤害消费者利益，最终只能是失去市场的信任。 王莹